

自選章節

坐立的屍

這是七十幾年前的台灣：

細雨中，有一具屍體被捆在竹椅上，以坐立的姿態，梭巡於礦村、農居、與田野間。風很大，雨時續時停。亡者坐得挺挺的，將死亡活生生地暴露在外。

希臘神話中，雅典娜是從宙斯的腦袋蹦出來的。年輕時，讀到這段描述，那意象有種說不出的血腥。多年後，在種種口述與傳記中反覆聽人提起這具「坐立的死屍」，漸漸感覺，假如要為鹿窟案尋找一個核心意象，大概就是這個畫面了。

竹椅的扶手底下，有長長的竹竿穿過，網紮固定，將椅子改成轎子的型態。抬轎的都是二十歲上下的男孩，他們一前一後肩起坐立的屍身，一邊敲鑼一邊高呼，「共產黨的警察隊長已經被打死了，村民有參加的，趕快出來自首就沒事了……」

對我來說，鹿窟案誕生於這個意象：

一個死人，被捆在竹椅上，坐著。

（據說是槍擊死的。但傷口在哪？我無從得知，也就無法推測死狀。死狀，何其殘酷的一個詞。然而，思考殘酷是為了思考人性。至少我是這麼想的。）

他的眼睛是睜開還是閉起的？

簡直是一具活體。活屍體。如此野蠻、生動，簡直超現實。

但馬奎斯說，他反對「魔幻寫實」這個概念，因為他筆下的世界盡是「寫實」而非「超現實」。「我們經歷的現實，成為你們眼中的魔幻，這是拉丁美洲的孤寂。」馬奎斯這麼說。

所以，讓我重來一次：

對我來說，鹿窟案誕生於這個意象——一個死人，被捆在竹椅上，坐著。然而，白色恐怖伴隨著三、四十年的戒嚴（那無限延長的「臨時」條款，將「例外」狀態拖延成半個永恆），將「發生過的事」驅趕至書寫之外、語言之外、記憶之外，以至於，多年後與這些細節相逢，惶惶中竟生出真假難辨的猜疑之心。這是真的嗎？未免太魔幻了吧。

「我們的經驗，我們的寫實，成為你們眼中的魔幻寫實，這是鹿窟的孤寂，也是台灣的孤寂。」為了抵抗孤寂，我們必須再次啟動這具「活屍體」。假如我

們可以重新經歷他的死，就能重新經歷他的生。這是實實在在發生在台灣的事，一個實實在在活過的人，在不算久遠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。

死者是一名男子，村裡不少人都見過他的。

死因是槍殺。然而此刻，正在重建細節的我們還不清楚，究竟是哪裡中彈。

事件第一天，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超過三千名荷槍實彈的軍人，將山村重重包圍，以「抓匪諜」的名義，將所有「可疑」的人拘禁於日後的「光明寺」、當時村民俗稱的「菜廟」。而「可疑」這個可疑的字眼，遍及了幾乎每一個出門的人，只要被軍人堵到，就以嫌疑犯的規格盤查。很長一段時間，說起包山那一天，人人說的都是「上萬軍警包圍」，那是「體感的恐懼」得出的、滿山遍野的密集感。直到西元兩千年前後，「上萬軍警包圍」，依舊是口耳相傳的共識。然而，近幾年公開的檔案中，可以清點出，那趟任務出動了三千多人，五十公尺一哨。

指揮官名叫谷正文。他的官銜並不大，「國防部上校通信員兼保密局偵防組組長」，雖說是上校，支領的卻是少將的薪水。整個九十四軍團（兩千三百人）外加九十六團第三營（五百人）以及兩個連、一個排、台北縣警察局、保安司令部與保密局的特勤與特務，全都要聽命於他。

他是王。一個將惡戲當遊戲的王。抬屍示眾的把戲，是他想出來的，他管這叫「在死人的身上下注」：以一具屍體為賭注，贏來數十上百倍的「恐懼的總和」。據谷正文自己說，自首的村民湧潮如水，「比汐止山邊的雨更讓人無法招架。」

操弄人心是他的專長。尤其擅長操弄某種「前現代」的迷信。

回到故事第一天，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。谷正文率領一個兵團外加一個「加強營」，在入夜後行動，於大雨中進駐鹿窟，隔天清晨完成包圍，五十公尺一哨，彷彿天羅地網，僅二十九號單日就抓了六百多人，男男女女不論老少，全都集中在廟埕。谷正文端坐在他的「王位」裡，好整以暇，叫被捕的村民一個一個輪流上前，讓他過目。只需一眼，他就能瞬間區辨誰有參加，誰沒參加，哪一個曾經畫押，加入所謂的「基地組織」，哪一個沒有。村民們依序排隊「接受檢驗」，一邊惶恐地圍觀著，等待自己的命運。神奇的是，這個從外面來的、說國語的特務，每一次都猜對了。「不吐實」的人，會被打到半死，直到承認為止。被打到半死的，甚至包括村長的女兒陳政子，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，她為了保護自己的父親與大哥，什麼也不肯說。

谷正文憑什麼那麼神？——他搭了一個戲台，演了一場戲。而他之所以那麼神，是因為他有權力。

早在上山包圍前，保密局已經抓了一個人，這個人名叫汪枝。汪枝在延平北路、台北橋附近被捕，供出了不少線索，他是鹿窟基地的資深幹部，負責聯絡與通訊，認識絕大多數的成員。谷正文把汪枝弄進光明寺，命令他躲在廂房的氣窗後面，「我會叫所有的人一個個從窗口走過。如果這人是台共成員，你就

把手放到窗台上。如果不是，就把手收回去。」就這樣，谷正文在這群礦工、農民、小孩、與文盲之間，扮演起「神明」的角色。

在晚年的回憶錄中，谷正文得意地說，「第一個被我叫住的人，呼天搶地大叫冤枉，第二個、第三個也是，不過，十來個之後，就再也沒有人喊冤枉了，只是眼裡流露著驚惶的神色，安靜地默認一切，連先前大叫的人也安靜了下來。大夥兒滿臉狐疑地望著我，怎麼樣也猜不透，我是如何分辨共產黨員的，甚至有人對我的胡指亂指大有意見。不過，一旦發現被我叫住的人多數認罪，且其他被別人指認出來的共產黨員，幾乎完全與我的判斷一致，就不得不把我當成神明看了。」

消息傳開之後，有些村民甚至在家門前供起了香案，備妥牲果、茶水，朝谷正文拜拜。谷正文說，「這事讓我覺得有趣極了，便索性扮起了神明。」在一九五三年初的鹿窟山村，在「山頂人」純樸、封閉、前現代的心靈裡，這樣的裝神弄鬼是有效的。

先裝神。再弄鬼。

軍隊殺了一個人以後，「立屍」於竹椅上，讓屍體出門值班，在山村裡整日巡迴，進行鬼的恫嚇。谷正文回憶著當時的自己，先是被當作神，隨後又有「鬼」的幫忙，事情順利得簡直無事可幹，「每天買雞買菜，偶爾還釣魚。」「度過了四十五天的雨中山居生活」。神的日子很悠哉，直到上面的人急著喚他下山，臨走，他留下一排的兵力，駐守石碇、汐止，每天入夜後，叫軍人在山路上來來回回，沿路高聲哭號，一邊對空鳴槍，就是要讓居民以為山上真的在鬧鬼。

檔案顯示，軍隊是在一月二十號下山歸建的，而保安司令部與偵防組的人員則持續駐守、問案，直到三月三日全數撤離。在「案情」大致確認以後，谷正文將十幾個年輕人扣在保密局。「我想這些孩子先留著，將來會有大用處。」他向自己的上級毛人鳳解釋：「老先生不是老要我們監視誰嗎？這些小孩子剛好可以在附近擺些小攤子就近觀察，再找些機伶的，教他們學騎三輪車，到附近去等生意，不就連跟蹤的人都省下了。女孩子就更好了，能送進這些人家裡當下女，效果才大呢！」多年後，谷正文在自己的回憶錄中，公然這麼陳述著，絲毫不感覺羞恥，可見他的道德尺度，與一般人非常不同。

而那些男孩女孩呢？除了偶有「任務」，多半的時間，他們都在谷正文的家裡當下人：打掃、煮水、做飯，當廚工、帶小孩，做木工、蓋雞舍、顧魚塢，養雞、養鴨、養魚，還養了幾隻名犬，負責出門販售……。他們總共有十九人。年紀最輕的是個男孩，當時十三歲，他在谷正文手下做了七年的奴工。

軍隊下山以後，那具可憐的屍體，終於可以下葬了。他是誰？又是怎麼死的呢？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回憶錄中，谷正文是這樣說的：「正當我扮演著活神仙，把參與基地的匪徒一個個指認出來時，人群裡突然冒出一個中年男子，他右手握著一把盒子槍，衝鋒般大喊著殺聲朝我衝來。直到這人快衝過封鎖線時，哨兵才猛地回過神來，連著朝他身上放了幾槍，這漢子應聲倒地。」谷正文接著說，「人群裡不時驚呼著，有人讚嘆也有人惋惜，我一直很留意村民的

反應，在哨兵檢視完屍體回來向我報告之前，百姓們已在議論著這人便是『警察隊長』劉學坤。」

在谷正文的回憶中，劉學坤手握短槍衝向他，在封鎖線邊緣被擊斃。這有驚無險的英雄時刻，為特務的人生抹上一筆戲劇化的浪漫色彩。很長一段時間，由於官方檔案的匱缺，這說法很少受到挑戰。然而，二零一七年最新釋出的國防部檔案顯示，故事不是這樣的。

鹿窟被封鎖的那個清晨，劉學坤就地逃亡，在荒野中餓了兩週，實在受不了，於是鋌而走險，闖人民居勒索糧食，對方知道「資匪」是會被判刑的，掙扎間武鬥了起來，被劉學坤的同伴砍了三刀。這個倒霉的村民，名叫高欽龍。部隊接獲通知後循線緝捕，想抓活口，開槍往腿部射擊，不料，劉學坤低伏著尋找掩護，反而被擊中腦袋，當場身亡。部隊在死者身上搜獲一枚身分證（化名林正義）、一把手槍、六顆子彈、手銬一副。劉學坤被抬進菜廟的時候，已然身亡，谷正文描述的那個驚險的、槍口逃生的時刻，只發生在他的「妄言」之中。

劉學坤是高雄人，日本商業學校畢業，原本是學運幹部，一九五零年進入鹿窟，發展地下工作。多年來，劉學坤的形象，一直凍結在他不得安葬的屍身當中，僵立在竹椅上，於朔朔的野風中歷經無情的日曬雨淋，外界無法確知他的死因，也無從確認他的死亡日期。他在各式各樣目擊者的口述中，凝結成一個令人戰慄的形象：殭屍。於今，我們可以從檔案中抽絲剝繭，拼湊出他可能的忌日：應該是一月十三日，當時他二十九歲。